

杨向奎 著

清儒学案新编

四

齐鲁书社

杨向奎 著

清儒学案新编

四

齐鲁书社



鲁新登字07号

封面题字：蒋维崧

责任编辑：白萍生

封面设计：王悦玉

版式设计：宋 悌

清儒学案新编

（第四卷）

杨向奎 著

齐鲁书社出版发行

（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）

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18印张5插页401千字

1994年3月第1版 1994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00

ISBN 7—5333—0230—3

B·45 定价：19.50元

《清儒学案新编》第四卷目录

- (一) 庄存与 《方耕学案》附：庄述祖…………… 1
- (二) 刘逢禄 《申受
宋翔凤 《于庭
学案》……………39
- (三) 孔广森 《彞轩学案》……………82
- (四) 凌曙 《晓楼
陈立 《默斋
学案》…………… 108
- (五) 龚自珍 《定庵学案》附：戴望…………… 149
- (六) 魏源 《古微学案》…………… 220
- (七) 皮锡瑞 《鹿门学案》…………… 275
- (八) 廖平 《井研学案》…………… 342
- (九) 康有为 《南海学案》附：谭嗣同…………… 408
- (十) 附：受今文经学影响的“《古史辨》派”…………… 548

庄存与 《方耕学案》附：庄述祖

庄存与（公元一七一九年，清康熙五十八年——公元一七八八年，乾隆五十三年），字方耕，号养恬，江苏武进人，乾隆乙丑一甲二名进士，授编修，以大考擢侍讲，官至礼部左侍郎，历任湖南、顺天、山东学政，典湖北、浙江乡试各二次。充天文算法总裁官及乐部大臣，直上书房、南书房垂四十年，以年老休致。方耕于六经皆能阐发奥旨，不事笺注，而独得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。著有《象传论》一卷，《象象论》一卷，《系辞传论附序卦传论》二卷，《八卦观象解》二卷，《卦气解》一卷，《尚书既见》三卷，《尚书说》一卷，《毛诗说》四卷，《周官记》五卷，《周官说》五卷，《春秋正辞》十一卷，《春秋举例》一卷，《春秋要指》一卷，《乐说》二卷，《四书说》一卷。统名曰《味经斋遗书》，又有《味经斋文稿》。

庄存与是清代前期《公羊》学的首倡者，此后这一学派重要人物几乎都受有他的影响，如其侄庄述祖，门人孔广森，外孙刘逢禄，侄外孙宋翔凤等。他生存的时代，正是清代由盛世逐渐转为衰危的时代，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趋于崩溃的时代。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正在滋长，表现在农业生产及租佃制度上是富农式的经营出现，庄头从地主手中承佃土地而转佃给贫苦农民。这种情况最早发现在南方各地区如广东，在北方如河北，

在旗地广多的地区，庄头取得了二地主的地位。这种情况使农民与地主的的关系出现隔离。如当时的奏议有云：“……直隶一省，旗民居多，若任业主以董庄田、任庄头以率散田，其为力尤易，而其法尤简。”（《皇清奏议》卷四四，赵青蒙乾隆十二年《疏》）“任庄头以率散田”，是庄头为代地主为散田主而取得二地主地位。后来演变庄头为庄田主，而大片土地归他管辖，是庄头取得二地主的地位，而新式的农业经营方式出现，意味着古老土地制度趋于没落，地主和土地脱离，相伴而来的是佃农和地主之间的依附关系逐渐松弛。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，对封建地主阶级来说，不是兴旺的象征，而是他们的末路了。

另一方面的情况与上述关系相辅而行，这就是土地兼并的加剧，大多数农民被迫为佃农而衣食不济，比如当时有人指出“旧时有田之人，今俱为田耕之庄，每岁收入难敷一家口实，必须买米接济，而富庄登场之后，非得贵价，莫肯轻售，实操粮价低昂之权”，（《皇清奏议》卷四四杨锡绂乾隆十三年《疏》）。这种情况本来是老问题，但愈演愈烈，以致阶级矛盾更加尖锐，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风暴遂久而不息，以致有大规模的太平天国起义。一方面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松弛，一方面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紧张，这都是使封建社会走向崩溃的原因，而在这一张一弛之间，资本主义因素随之萌芽。这一来表现在土地经营上，同时也表现在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上。在乾隆时代，商贾的力量较快膨胀而成为政治经济领域中的重要力量，而农民一不如地主，二不如商贾，以致地主阶级也在谈论：“农民最为苦，无田可耕则力佃人田，无资无佃，则力佣自活，……以苟免饥寒，即为乐岁。……此等民人自以为上不如，有田之户得蒙恩免地丁钱粮之惠，次不如服贾之家得被恩免

关津米豆之税，……夫同为圣世之民而有田之户与服贾之家得受国家蠲免之泽。”（《皇清奏议》卷四五刘方嵩乾隆十四年《疏》）本来在封建社会初期商贾是受排挤的，如今地位突出，几乎和地主阶级等齐了。社会上的地位说明他们的经济力量。这新兴的力量要和旧的地主进行较量了，也就是资本主义萌芽脱颖而出了。商业资本虽然还不是资本主义的资本，但是它的前身，是资本主义最初的表现形式。

现象比较复杂，引起的社会矛盾也是复杂的；地主和农民间的人身隶属关系出现松弛，同时他们之间的矛盾又形激化。在这一张一弛的夹缝中商业资本有了发展，形成了资本主义萌芽。这萌芽要发展壮大成为最终埋葬封建社会的主要力量，因之地主和商人之间存在着矛盾，对于地主阶级来说，未免有大祸将临的感觉，而农民起义的加剧，更使他们心寒，他们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濒于倾危，于是他们出于自救运动而求助于多变的《公羊》学。在封建闭关时代，地主阶级只能在历史中找出路，而没有横通。从前期《公羊》学的发展中，我们知道地主阶级用以自救的方式有二：一是世族地主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强调《公羊》学中的专制主义；一是新兴地主阶级为了争取新的统治力量而运用《公羊》学中的改制思想。庄存与的时代是原有的地主阶级感到处于危亡的边缘要进行自救，要巩固这原有的阶级秩序，但他们还有改制的要求。

思想反映现实的要求是曲折的，庄存与的著作中我们看不出这种要求，但在孔广森的思想中反映世族地主的意识形态是显著的、自觉的。后来资本主义萌芽更加发展，在龚自珍、魏源的著作中，资本主义的思想已经呼之欲出了，晚清的康有为则以资本主义社会为理想的太平世。

庄存与是一个经师，他不是具有改革意图的思想家，因此他直接牵涉到政治问题的理论较少，但在他的思想中要求巩固旧有的阶级秩序的愿望是强烈的。原来的《公羊》学派的历史观点和政治理论相结合，他们的历史观进退于先王、后王之间，所以他们的改制理论并不彻底，即使要建立地主阶级的新秩序也抛不下旧有的世族地主。庄存与的时代变了，他自己也不是一个有见识的历史学家，他用以和政治理论相结合的不是传统的《公羊》学历史观，而引进了宋代理学，这未免混淆了学统，比如在《春秋正辞·奉天辞》中他引用二程的话道：

人理灭矣，天运乖矣，阴阳失序，岁功不成矣，故不具四时。

以理学讲《春秋》，这是新的“天人之学”，前所未闻，混淆了汉宋。宋翔凤在《论语》中觅《公羊》之理论根据，也许是受此启发，而后来的康有为却是由理学走向《公羊》。

庄存与不仅混淆汉宋而且是不分经学今古。在传统的学术流派中，汉学宋学本来泾渭分明，庄存与能够兼容并包，一方面说明他的学风，一方面也是适应当时的社会需要。为了巩固这原有的阶级秩序，他使用两道堤防。同是经学，今文和古文，两汉以来互相水火，《公羊》学派对古文经更不相容，因之它排斥古文经《周礼》，但庄存与却以《周礼》济《公羊》之穷，这为后来的《公羊》学派开辟了广阔前景，后来的廖季平以《公羊》派而鼓吹《周礼》，以为是“大一统”的宝书。《公羊》学是一部空头理论书，是一部历史哲学，不具备政治条文及具体的典章制度，因之要借《周礼》以明“周监”。庄存与虽然不是变法改制的鼓吹者，但他也重视《周礼》，在《周官记》中他说：

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，先务于农民。农非徒为地

利也，贵其志也。民农则朴，朴则易用，易用则边境安，主位尊。民农则重，重则少私义，少私义则公法立，力专一。民农则其产复，其产复则重徙，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。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，不令则不可以守，不可以战。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，不令则不可以守，不可以战。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，其产约则轻迁徙，轻迁徙则国家有患，皆有远志，无有居心。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，好智则多诈，多诈则巧法令，以是为非，以非为是。

齐民务农与否的问题，对封建国家来说有三利三不利。这些议论和先秦法家，尤其是商鞅的学说，非常相近，重农轻商，他们认为是富国之本。我们可以说，《公羊》是沟通儒法之间的桥梁，与荀子相近，属于齐学系统。

庄存与在《春秋正辞·内辞第三·士功》条中也谈到此一问题：

王事惟农是务，无有求利于其官。以于农工，谷不可胜，由此道也。

所谓“农工”即“农民之工”。先秦法家鼓吹“农战”，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，从事农业生产；战时从军，保卫国土。所以庄存与以经师而谈政治，由《公羊》出发，借鉴《周礼》，遂与法家殊途同归。《周礼》也尚法重农，和法家不二，《公羊》学而讲《周礼》，重农尊法，更接近法家；那末《公羊》与《周礼》不存在无法跨越的鸿沟。庄存与之沟通二者的关系，具有卓识，后来廖季平张大其说，而康有为却大唱反调，重《公羊》而斥《周礼》，两者间又有鸿沟，时代变了，康有为改制不必借鉴《周礼》，他向资本主义社会迈进，不需要巩固封建制的《周礼》了。

庄存与究竟是《公羊》学家，他理想一个大一统的天下，这是《公羊》学的伟大传统。他所处的时代，正是新的“南夷与北狄交，中国不绝若线”的时代。在南方，英国资本主义势力正在叩关，他们的鸦片烟船正停舶以待；在北方，沙俄的势力正在得寸进尺，蚕食鲸吞。这不是四夷进于爵的太平世，而是抵抗夷狄的乱世，所以他的“大一统”不能与“张三世”的理论相结合，而止于“内诸夏而外夷狄”。在《春秋正辞·大夫见天子》条，他说：

周公欲天下之一乎周也，二之以晋则不可，其不可于
是始，君子谨而致之，欲天下之一乎周也。

他没有进一步说明“夷狄”进而为中国的道理。“欲天下之一乎周”，对方耕来说，也就是“欲天下之一乎清”。“欲天下之一乎周”而不可得，但遂转而肯定“二伯”，因为齐桓晋文是能够抵抗四夷、维持统治秩序的人。他指出：“诸侯无伯，亦《春秋》之所恶也。则其不主晋何？曰：诸侯之无伯也，晋哀公始为之也，不主晋于是始，而王道行矣。桓、文作而《春秋》有伯辞，实与而文不与也。”（《春秋正辞·诸夏辞第五》）

“实与而文不与”，是《公羊》义法中之不得已！“实与”是实际上赞许其维护当时的社会秩序；“文不与”是不能公开地称道这以伯代王。在同书《二伯辞》中他又发挥道：“未有言同盟者，其言同盟于幽何？齐桓自是为诸侯正也。……齐主命则其言同盟何？夺其为正之辞也。……曷为夺之？有天子存，则诸侯不得主诸侯命也。……盖自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，天下且见为当然，而相率以安之矣”（《春秋正辞》第四）礼乐征伐乃王者事，不能自诸侯出，有之，亦非不得已，只能“实与而文不与。”

“大一统”是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有不同内容的口号，维护旧统治秩序及成立一个新的统治秩序。庄存与处在清代《公羊》学的前期，还是清代“盛世”，这个时代要求他维护这种旧秩序，而没有建立一个新社会的要求，所以方耕要以传统道德学说济《公羊》之穷而引入理学思想。理学与《公羊》结合的结果，使今文经学增加了新的内容。这新内容不仅是为后王立法，并为后王立下道德规范。在同书《诛乱辞》中他说：“《春秋》礼义之大宗也，治有司者也。”法可穷，“春秋”之道则不穷。“法”是随时代之变而变，“道”是不变的，以不变济变，故可以无穷。

正如上面所指出，庄存与的时代，是新社会正在萌芽的时代，新的经济萌芽，新的意识形态萌芽，新生的力量在萌芽。这些萌芽都在冲击着旧有的统治秩序、旧有的经济关系，旧有的思想行为，一切价值观念都在变换着。庄存与作为多变的《公羊》学者应当适应或者推动这种变换，但也如我们曾经指出的他是巩固旧秩序的《公羊》家，打算以变来维护不变，所以他说：“乱天下之大防者晋也，诸侯以晋为正，实以力为正，自时厥后，苟有力其从之，何知仁义？以享其利者为有德，其机在此，此谓‘大恶’。”（《春秋正辞·诸夏辞第五》）晋为当时大国，《公羊》虽然肯定晋文的霸业，但方耕以为自时厥后，屡乱天下之大防，而诸侯以之为正，以此为正，乃“享其利者为有德”，新的霸主遂代周王为有德者。在西汉，因为是新兴地主阶级代替了旧的世族，所以司马迁说：“何知仁义，以享其利者为有德。”在《外辞》中，方耕又提出：“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为诸侯。”这也是司马迁提出的道德学说，道德规范不是不变的，谁是主人谁就是道德的化身！

“何知仁义，以享其利者为有德”。既可解释为旧统治者辩护，也可解释为新生力量辩护。稍后，当太平天国起义前夕，龚自珍曾经有歌颂“私”字的文章，这是新的消息，崭新的价值观。在前资本主义社会，“私有制”是不完备的概念，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，“私有”才是不可侵犯的神圣概念。如果庄存与在维护旧秩序的基础上，而压抑新生事物的生长，并不是《公羊》学者应有的作风，《公羊》学究竟是地主阶级的应变哲学，在地主阶级走投无路的时代，他们打算在变，在不变更原有基础上的变，谋求改变一些制度来巩固这已动摇的基础。所以庄存与也在“讥世卿”，这是向世族地主挑战了。他说：

公羊子曰：讥世卿。世卿非礼也。其圣人之志乎？制《春秋》以俟后圣，后世之变、害家凶国，不皆以世卿故，圣人明于忧患与故，岂不知之？则何以必讥世卿？告为民上者，知天人之本，笃君臣之义也。告哀公曰：义者宜也，尊贤为大。……是故非贤不可以为卿，君不尊贤则失其所以为君，彼世卿者，失贤之路，蔽贤之蠹也。……世卿非文王之典也，无故无新，惟仁之亲，尊贤养贤之家法也（《春秋正辞·天子辞》）。

在清朝，世族是八旗贵族，他们世官世禄，掌握大权，非八旗贵族不据要津，于是新人被抑，庄存与遂鼓吹尚贤。当社会处于变革的前夕，贤人多属未来的阶级，于是方耕在“讥世卿”。“讥世卿”本来是前期《公羊》学者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反对领主贵族，庄存与也是站在非贵族立场来“讥世卿”，这种思想就随着新兴力量的增长而增长。当然庄存与并没有变法改制的思想，他的时代没有向他提出这种要求，他只是希望非八旗贵族也有贤人当政因而在“讥世卿”。但不能以旧补旧，

这些贤人往往是些新人，庄存与以后的《公羊》学者出了许多新人，龚自珍、魏源都是新人，他们具有新阶级的思想意识，康有为、谭嗣同等人更是具有不同价值观的新贤人！

庄存与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《公羊》学派的创始人，两汉以来《公羊》学已沈沦千年，因为它是一种地主阶级的应变哲学，当中国封建社会濒于崩溃的时期，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又感到有变的必要，于是庄存与出而提倡《公羊》。这是有深厚基础的绝学，它的复起是有基础的。但在乾隆时代，封建社会还没有崩溃，只是崩溃的前夕。一切新因素都在萌芽状态，对《公羊》学者还没有去掉旧的，改变制度的要求，以此庄存与之鼓吹《公羊》只在维护旧的，没有新的要求。时代在变，新因素在发展，而外来的侵略势力咄咄逼人，于是《公羊》学者不再保护旧的而是在提倡新的以应付这新的局面！

附：庄述祖

庄述祖（公元一七五〇年，清乾隆十五年——公元一八一六年，嘉庆二十一年），字葆琛，所居室曰“珍艺宦”，所著书曰《珍艺宦丛书》。学者称珍艺先生，父培因为方耕弟，乃弟兄鼎甲，称颂一时者。珍艺乾隆庚子成进士，选山东昌乐知县，调潍县，后署曹州府桃源同知。其为学严本家法，于今文义法，少所发挥而深通六书之学，但仍持今文家言，右《公羊》而左《左氏》，如云：

《春秋》之义，以《三传》而明，而《三传》之中，又以《公羊》家法为可说。其所以可得而说者，实以董大中综其大义，胡毋生析其条例，后进遵守不失家法，至何劭公作《解诂》，悉隐括就绳墨，而后《春秋》非常异义可怪之论，皆得其正。凡学《春秋》者，莫不知《公羊》家诚非《谷梁》所能及，况《左氏》本不传《春秋》者哉！假设无诸儒之句剖字析，冥心孤诣，以求圣人笔削之旨，则缘隙奋笔者皆纷纷籍籍，以为《左氏》可兴，《公羊》可夺矣（《夏小正经传考释·自序三》）。

尊何休之《公羊解诂》，以为使其中微言大义，悉隐括就绳墨，而后《春秋》之非常异义可怪之论，皆得其正，而《公羊》在三传中，高于《左氏》及《谷梁》，可以论定。后来虽有诸儒之缘隙纷纷，终不能“谈经夺席”也。珍艺于《说文古籀疏证》

中更指出“六经遭秦嬴之厄，幸而得存于今，其无缺误者盖少，《毛诗》最古，《仪礼》、《周礼》次之，《礼记》次之，《公羊春秋》次之，其余若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左氏春秋》、《谷梁春秋》则多晋以后之俗字矣”。又从文字角度说明《公羊》之优于《左氏》、《谷梁》，盖珍艺固以音韵训诂自负者，朴学之风，使治义法者亦向往不已，孔广森、刘逢禄皆音韵学家，庄述祖亦不甘落后。

又以为刘歆窜改《左氏》，他说：

《左氏春秋》经刘歆私改者，如“壹戎殷”，改“壹”为“瘞”。经杜预误写者，如“不殄”读为“不夕食”，此皆不明古义。刘之逞臆虚造，杜之袭陋传讹，其失一也……。（《说文古籍疏证》）

刘歆乃《公羊》学者斥为汉代之窜改古文经者，至清末康有为则以为刘歆、王莽，一篡古经，一篡汉朝，君臣同篡，君臣同伪，固千古之罪人。

珍艺治今文遂及《白虎通》，于《白虎通义考·自序》中说：

汉中兴初，五经立学官者：《易》施、孟、梁、邱、京氏，《尚书》欧阳、大小夏侯，《诗》齐、鲁、韩，《礼》大、小戴，《春秋》严、颜，凡十四博士。《谷梁春秋》甘露中曾立之。光武欲立《左氏》，诸儒廷争者累日，既得立而即废。建初中选高才生受《左氏》、《谷梁春秋》、《古文尚书》、《毛诗》，顾第以广异义，此功令也。《白虎通义》杂论经传……，《春秋》则《公羊》而外，间采《谷梁》，《左氏传》与《古文尚书》当时不立学官，书且晚出，虽贾逵等以特明古学议北宫，而《左氏》义不见

于《通义》……

两汉经学今古之争不绝，后至清朝，《公羊》兴而抨击《左氏》、《周礼》之说，更风起云湧，以至史学界谈古史不及《左传》，谈宗周不及《周官》，胜利虽属今文，但抹杀《左氏》、《周礼》之史书价值，实为学派斗争之缺点，但就义法言，《左氏》、《谷梁》不及《公羊》，《公羊》之微言大义，固曾为中国封建社会季世之医世良药也。庄述祖如此出力，虽然他并不以此自居，而认为长于文字训诂。生平著述甚富，刊行者有《尚书今古文考证》七卷，《毛诗考证》四卷，《毛诗周颂口义》三卷，《夏小正经传考释》十卷，《五经小学述》二卷，《白虎通义考》一卷，《说文古籀疏证》廿五卷，《石鼓然疑》一卷，《珍艺宦文钞》七卷，《珍艺宦诗钞》二卷等。

《方耕学案》学术思想史料选编

《春秋正辞·叙目》

武进庄侍郎存与著

存与读赵先生沅《春秋属词》而善之，辄不自量，为彙括其条，正列其义，更名曰《正辞》，备遗忘也。以尊圣尚贤信古而不乱，或庶几焉。叙曰：

大哉受命，钊我至圣，弗庸践于位，皇惟飨德，乃配天地，正《奉天辞》第一。

王者承天，以抚万邦，为生民共主。嗟嗟周德，光于文武，亦越既东，元命永固。永固在下，诸侯以僭，大夫陪隶，用贵治贱，挈诸王者，正《天子辞》第二。

於乎厚哉，周公光大，成文武德，劳兼不伐，万民以服。元子在东，有典有册，欲观周道，舍鲁奚适？圣人无我，曰父母国，正《内辞》第三。

三王之道，仁义为大，假之以为功，乃救罪不暇，一匡天下，实惟桓公。晋文继之，亦惟在王功，曰正曰谏，一夺一予，楚庄、晋悼，彼何足数，正《二伯辞》第四。

自天地生民以来，神圣有攸，经纬于是焉。在圣所贵，贵其民循厥理，惟庶邦君以厥臣续大命，孳孳其无殆，黜乃心毋底罪，正《诸夏辞》第五。

荡荡覆载，圣则无私，畴不即工，圣其念之，明明时夏，懿德所经，顽黷聾昧，乃狄之行，於乎慎哉，正《外辞》第六。